

张谷林 / 著

论中华魂与根文化

罗哲文题

中国长城峰岭文化现象

中国长城精神文化 中华天文化和玉文化

全民族中轴线文化 北京三堡村石像文化

综合研究文集

第一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论中华魂与根文化

罗哲文题 

第一卷

张谷林 〇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中华魂与根文化: 全 3 册 / 张谷林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 - 7 - 5034 - 9374 - 4

I . ①论… II . ①张… III . ①中华民族 - 民族精神 ②中华文化
IV . ① C955.2 ②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0742 号

责任编辑: 窦忠如 蔡丹诺
装帧设计: 首德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72.25
字 数: 132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0 元 (全 3 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张谷林

张谷林，汉族，中共党员，1952 年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祖籍山西省忻州市。

现为中国长城学会会员、理事、常务理事，长城峰岭文化专家（独立学者）。数字长城工程委员会委员。

1968 年上山下乡在山西务农 6 年，体验了农耕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曾任知青队长、公社党委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在南京军区红一连服兵役 5 年，其间作为军代表“三支两军”，在煤矿井下掌子面挖煤 8 个月。后考入安徽大学学习英语，因“文革”影响肄业。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七机部一院（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任工程组组长，负责“两弹一星”专用大型计算机 109 丙机正常运行工作近五年时间。其间，该机两次被评为全国计算机正常运转第一名，后被誉为国家“功勋计算机”。

改革开放后，在海内外经商、办企业 26 年。曾参与设计北京四、五星级酒店两家。1988 年初向因转型遇到严重困难的国家工业部门捐款 1.5 亿元人民币。1989 ~ 1990 年作为台湾九大旅行社总代理，在中国旅游业整体低迷时期成功启动台湾 13 家大型旅行社，组织台胞赴大陆旅游达 100 万人次，推动了中国旅游市场的复苏。90 年代参与国家多项高科技人才和技术交流引进研发工作，获得国家级毫米波烧结高性能陶瓷和大功率超薄型电阻器火炬计划二项，被国家领导人誉为“大面积丰收”。90 年代后期至 2000 年后完整重组及组建大型投资型和互联网络企业，为中国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提供了切实完整的与 B to B 结合的互联网络 ERP 全程管理及企业、个体、政府、金融互联网电子交易、支付、信誉等 3+X 成套解决方案以及多种网络应用配套产品。

几十年来，保持对科技、历史和文物的热爱，学习笔记和习作千万字。发表高性能陶瓷论文和文物研究文章数十万字。

生活和工作实践，使作者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的一切与民族的一切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强盛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需体现在文化软实力上。很希望将自己对历史文化的点滴学习和研究成果，投入在民族的文化和文物保护事业中，为民族根、文化魂、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原理传承再尽绵薄之力。

中国长城峰岭文化现象

中国长城精神文化 中华天文化和玉文化

全民族中轴线文化 北京三堡村石像文化

综合研究文集



长城与北京中轴线 研究的新篇

(书评代序)

徐自强

前几天，张谷林先生送来《论中华魂与根文化》的书稿一部并约我写序，深感惶恐赧赧，可是同好相交之谊，又难言拒绝。茫然之中，开始阅其文。粗读一过，稍有所悟，故草成此文。如还可用，就勉为《代序》吧！

张先生多年从事科学工作，尤在计算机、旅游、高性能陶瓷烧结和网络等领域是行家里手，对社会颇有贡献；但是，他对文物、考古工作实事求是地说，只能是兴趣浓厚的业余爱好者。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同志，却写出一部以文物、考古题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而且还从中提炼出了“中华魂”“根文化”的重要思想，这第一个印象即使我感到“惊奇”；文中又看到他把自古以来就是防御性工程的万里长城、北京城建的中轴线、三堡村的石像群，三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研讨，并从其不易察觉的本质中，探索出共性和有机的联系，这又给了我一个“惊喜”。

“二惊”之后，促使我思考：张先生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有什么根据呢？为此，我立即涌上一股阅读该文的兴趣与激情。再读一遍，使我感到其书真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创意的新作，甚至有一些“内行”人也不敢涉及（或者说未能涉及）的亮点。正所谓“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一些“山外”的人们，倒可能是眼界开阔，头脑清醒，思想深邃，能够去求索一些“内行”人不愿去涉及，或者是未能想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义、有启迪性的见解。所以，我觉得一些“行内”之人，千万不要轻易鄙弃一些所谓“行外”之人所作的论述和所提的一些新观点，谓其为“行外话”而自以为高远、自得。

读其文后，感到其论著很有特色，归纳起来略有三点。

第一，行文从微观提出问题，从宏观进行分析探讨。所谓微观提出问题，是指先从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一些有根据的文献记载，或者也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有文物或遗存可考的实物出发进行讨论研究，这就言之有据，说之有理，不是空对空的猜测，从而使所提出的见解和得出的结论，有材料的依据。所谓宏观的分析探讨，是指有开阔的视野、远大的眼光，不局限、不拘泥于一些具体细节，因而对一些问题看得深、看得透，能从材料、事实的背后隐处发现问题，提出见解。

例如：张先生在论述长城峰岭文化时，是从元明清三代都有权威历史文献记载的“枕居庸”三字组成的一词出发的。对于“枕居庸”一词，他说：“‘枕居庸’最早的记载，出自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和《元史·志第十·地理一》，均把此四字明确为‘枕居庸’三字，比元初的‘背负关岭’更能达意，因而成为固定的特指词组……”

“背负关岭”为元人郝经建议定都北京所依据的见解，与“枕居庸”词义相同。如将“枕居庸”一词分言之，“枕居庸”字据《易经》中《易·坎》等卦辞的解释有谨慎小心、居险能安之意，比“背负关岭”更能达意。这是传统的“易”文化中具有的“安”与“险”的两重性忧患意识，是将生存忧患意识摆在第一位的原则。“居庸”二字，据复旦大学杨宽教授，在《战国史》著作“战争中防御手段的进步”等文中记载，最早可能出自战国时著之《吕氏春秋》中如“居庸塞”之作用。其意为有防御作用之关隘。经过多角度的分析，最后张先生从宏观的高度作出解释，认为“将中华传统的根文化、儒家文化核心理念、周易文化观念与训诂学方法相结合，对万年以来历史著名的‘居庸’（径、塞、关）文化地理意义进行论证，‘居庸’二字应具有倚险而居安于中庸之道的本义，也就是因险而保障和平安定之中庸关岭的梦想。学者们基本认为……中庸之道所颂扬的是守中持理天文化本源根意识。……‘枕居庸’的文化意识信仰思维，既具有‘天人合一’的根文化尊崇祖先本源，又具有儒学的多种理念，还存有因险而安的多民族一统往来的期盼梦想。这样理解‘居庸’（径、塞、关）名称的最早期燕国原始出处与字义似乎更为恰当，更符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文化



意识信仰思维的变化，才会与后世元、明、清三代中华帝王等都非常追捧的‘枕居庸’文化意识信仰思维雅俗贯通。”（见本书第一卷第334～336页）

又如，张先生在论述北京城元、明、清时期的中轴线时，也是从元明清北城墙中，都只有二侧门，而没有与南城墙有三门相对应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着手的。如他说：“现代北京城的早期规划建设是元大都。饶有趣味的是元大都和明、清三代北京的城郭，既没有正北门，也没有从钟鼓楼中心点通向正北城郭的大路，似乎与《周礼》规定的礼仪礼制不符，引起现代人们的许多猜测。”的确如此，这个北城墙缺中间大门的状况，与我国过去的城是不一样的。如唐代长安城，就是东西南北都各为三个城门，北墙正中门则是有名的“玄武门”。北京城前身的金中都，初建时，就是每面三个城门，其北墙之三门，自西往东依次为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到金中期时，因皇帝要到东北方之万宁宫避暑，又在北城东边新开一门，名为光泰门。对此种情况，恐怕不能仅用北面风沙大、常有寒流等冷空气袭击以及堪舆风水等一般理由来解释，而是包含另外更为深藏的理念。同时，张先生在论述长城与北京中轴线的关系时，又是从“墙”这样一个极微观的角度出发的。这些问题，通过张先生从宏观角度的多方探讨与思考，得到的认识是：

“依据元、明、清三代历史文献都记载的‘枕居庸’建都形势天文化格局，以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交会的居庸陁北口，现关沟八达岭‘北门锁钥’长城关城门为起点，经长城居庸两关城门，再经元大都西北城郭的健德门，至元大都的中心点（钟鼓楼）为终点，可拉出一条笔直的堪舆‘天门线’。从中心点再往微偏东南的方向延伸，即建设成北京城市的传统中轴线。随着‘枕居庸’天门线连接北京中轴线中心点，长城峰岭文化现象意涵的中国万里河山融入了北京城。元大都的这条天门线，连同地面基本并行的皇家巡幸御道，让今人意想不到的直线连接了五座间隔百里以上的北京古城门楼和钟鼓门楼。元代的居庸关岭，应该是元大都城的第一‘天门’。这样，元大都城郭就有了12座门，表明元大都城门的周礼礼制到位。”（见本书第二卷第251页）

“北京城市700多年的中国国都文化中，在中国的长城与北京的中轴线之间，有关点、线、门、墙、城的信仰意识形象思维文化关系得到了完美体现，尤其是‘点’‘线’‘门’‘墙’的象征关系在其中最为突出，这是由准确的历史记载和文物‘天门线’的衔接所认定的历史性扎实表现。这个‘点’是堪舆‘中心点’的点，这个‘线’是‘天门线’与中轴线的天地双‘线’，这个‘门’是众多个长城关隘、城墙、建筑连接对称之‘门’，这个‘墙’可以理解成屋舍蜗居之‘墙’、对称之‘墙’、城墙之‘墙’，也可以理解成长城与国都皇四城之‘墙’。同样都是墙，墙体有门。墙体可以围成四方形‘点’的宫苑之墙、城市之墙，也可以建成一条‘线’的长城之墙直接连通昆仑

山。城市的墙形态，有以多种类对称墙体形成的门与门通达为‘中’的中轴线大路。”

与此相应，张先生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卫德礼著作中引用《诗经·商颂》后的解释文“中国城市中的中心大路的重要性，不在于视觉上的突出，而在于其象征意义。实际上它的全部街景永远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呈现在眼前。它并不是由一系列的空间所组成的一个中轴线上的完整街景。沿着北京这条中轴线行进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大门、城楼以及城垣（墙——笔者注）的延续。”（见本书第二卷第251～252页）这实际上也透露出张先生对此也持相似的看法。

再如，在探讨元明清中轴线时，对清朝人的看法，也只引用了乾隆御制碑文一件具体的文物，它实实在在，明确清晰，尽人皆知，是任何人也不能怀疑与否定的，但其分析论述却是宏观的，有深邃的思路和远大的眼光。

其御制碑方形，乾隆十八年（1753年）立，放置于永定门外燕墩之上，此处正当老北京城中轴线南端，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燕墩始建于元代，俗称烟墩。地处元大都丽正门外，系为一座做烽火台用的土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城加筑外城才以砖包砌。据文献记载，在元、明两代北京有五镇之说，烟墩即为南方之镇。

御制碑主刻乾隆皇帝所作的两篇诗文，故全称为《乾隆御制碑》。碑文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帝都篇》，共227字，其中序文86字，诗文141字；另一为《皇都篇》，共229字，其中诗文136字，序文93字。全碑还有诗篇名称各3字，诗篇落款30字。全部内容共计456字。20世纪末，首都博物馆建设时，又发现一件。2005年从先农坛院内地下发掘出土的一块与燕墩碑内容形制基本相同的四方碑刻，竖立于该馆北大门东侧。首博在说明文字中介绍说：“碑文是研究和展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正是由于碑文的存在，乾隆御制碑堪称国宝。”

张先生抓住这件经文博专家和官方认定的皇家实物与文献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全面的微观和宏观的分析与探索，提出了一些很有启示性的见解，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他说：“永定门燕墩御碑的中华传统地理文化方位，体现出该碑及碑文的全民性和历史性意义。作为一国最高统治者，作为传统中轴线的南端点位置，乾隆在永定门外筑台永久竖立这样的一块巨型石碑，一定有统治者的重大用意。依据有中华文化总源之称的《周易》‘与时偕行’‘与时偕极’‘与时消息’等文化思维理念，考察御制碑和御碑台所在方位，无论如何以‘周易’文化思维分析，燕墩所在的地理文化方位和内容，立于北京中轴线‘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的御碑台，都属于‘易经’中的‘巽风’所在地理文化



方位。这个‘巽风’的文化思维概念，基本是‘诏告’天下，‘教化’天下百姓。意思是说，由乾隆皇帝代表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宣告了一种针对北京中心城市（中轴线）的文化解释，普天之下的百姓都应该知晓这些解释的文化深意。既然是面向天下老百姓的，该碑诗篇就不同于一般的帝王诗文。诗文也没有明确提及儒学等单一传统文化，就不能局限于皇家文化，或者统治者文化。而且其所首次公开宣扬的是具有相当程度的中华根文化，碑文就有全民教化的中华梦想性质。”（见本书第二卷第 307 ~ 308 页）

张先生在分析了两篇碑文中涉及的“在德不在险”“节之中和”等诗序内容后，又着重地指出其义说：“‘中和’与‘德’，与中华最古老的‘天、地、人’三才，有极为密切的传统文化交互关系，是《周易》中一个非常突出而又至关重要的思想，也是中华文化数千年以来集中体现的中华精神文化最本源的意识思维。以至于后世中国历史上的古都邑，都强调儒家总结根源文化中的‘贵和尚中’的基本思维，赋予中国古代帝都和谐、严整、方正、秩序的文化特色。……‘中和’文化思维，广泛地闪现在古代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天人合一’这一古典哲学核心命题的融合，贯通在古人关于天、地、人三界的理解中，成为天、地、人‘三才’的基本品格，是古人‘天’文化内涵的重要理念之一。”（见本书第二卷第 317 页）

张先生通过对全碑“诗文”和“序文”的宏观的综合的分析后，对乾隆御制碑作出两点重要评价：

（1）“如果说，‘形势’‘沿革’只是历史上帝都与皇都的文化表象，‘德’与‘节之中和’确是全诗篇（长城、中轴线与国都）的文化灵魂，是表面与内核、表中层文化与底层文化不同层级的密切关系。‘德’与‘节之中和’与中华民族尊崇同一祖先的传统天文化（天人合一、天地人底层文化）实为一体核心。这些文化关系从中华根文化的高度，体现出乾隆在对待北京帝都、皇都和中轴线的认识上“执中和便能追原终始”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在其两首诗词篇章的序中，表述为‘还淳返朴’和‘俊逸清新’，在上下篇两首诗文中得到了充分运用。”（见本书第二卷第 320 页）

（2）“关于倡导同一祖先和民族融合的问题，在乾隆的帝都标准上表现得最为明确，关乎御制碑全部诗文的准确释义。这就出现了一条界限，形成一个标准。笔者管见，历史是矛盾的统一体。用文化进步的眼光辩证地看，乾隆的认识虽有封建社会满清统治者意识的偏激局限，但还是与时偕行的。因为历史上黄河一线的大都邑，基本都是昌盛于大汉族的都邑。乾隆诉求的是一个全民族大统一的国家，清代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北京就是这样的一个多民族融合国家的历史帝都，到乾隆御制御碑诗文时，清代逐渐强盛已逾百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合理解释，乾隆倡导的是尊崇同一祖先的信仰意识、中华大统一

的民族格局。从清代的民族政策和实际情况看，这些是符合历史基本事实的，而且是做出了巨大推动的。显然，乾隆在诗中直接描述的‘唐虞’或‘陶唐’时代，是华夏多族群融合的时代，是拥有北方游牧狩猎族群最大地理疆域的……这几句诗……实质上却是在讲北京地望。‘冀方’就是北京地望所代表的北方帝都。北京地望的‘形势’和‘沿革’，是尊崇全民族同一祖先大统一意识信仰概念，而且是有中国早期史学、考古文化渊源的。……乾隆所指的尧舜之都，虽然至今都还没有完全定论，但是属于‘冀方’仍然是有把握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全民族大一统的最早形势发生在北京地望一带。乾隆作为当时中国之共主，对中国‘帝都’的‘形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标准，就是全民族的统一，这是‘宣帝’的根本解释。按照乾隆诗文中的观点，以及与现实的学术研究结合考虑，北京地望（幽、冀方）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万国’氏族大一统性质的中华华夏都邑所在地，这个都邑的地理方位起自于老祖宗黄帝的‘合符釜山’地域，并且有可能延续了五帝之间的很长时期。至少从学术与实际考古结论看，北京地望第一都的历史在中华文明史存在了5000年。”（见本书第二卷第327～328页）

〔注①〕：考古学教授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中的一段，正好反映了此一观点。文曰：“关于陶寺遗址，前面已经谈过一些。把它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种形式，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文明火花。如从国家形成的模式看，它是以外部因素影响为主形成的次生型‘古国’的典型实例。陶寺遗址发现的斚、鬲、彩绘龙纹陶盘，彩绘、朱绘黑皮陶器，包含了北方因素，根本与北方有关（图153）。红山文化已出现彩陶龙纹，红山文化末端已出现朱绘黑皮陶器，陶器圆底腹斚到三足捏合而成的鬲的序列的圆形可以追溯到河套东北角（河曲）与河北西北部出土的尖圆底腹斚，陶寺还出土一种扁壶系列，它们的近亲只能到远方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去寻找，墓葬随葬品中类似‘厨刀’（L字形）的石制切割器，更要到远方浙北杭嘉湖去攀亲。与它们共出的‘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还有成套的朱黑漆木器。所以晋南陶寺文化是又一次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聚变火花。我们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理解：距今7000至5000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相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至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图1），这就是陶寺。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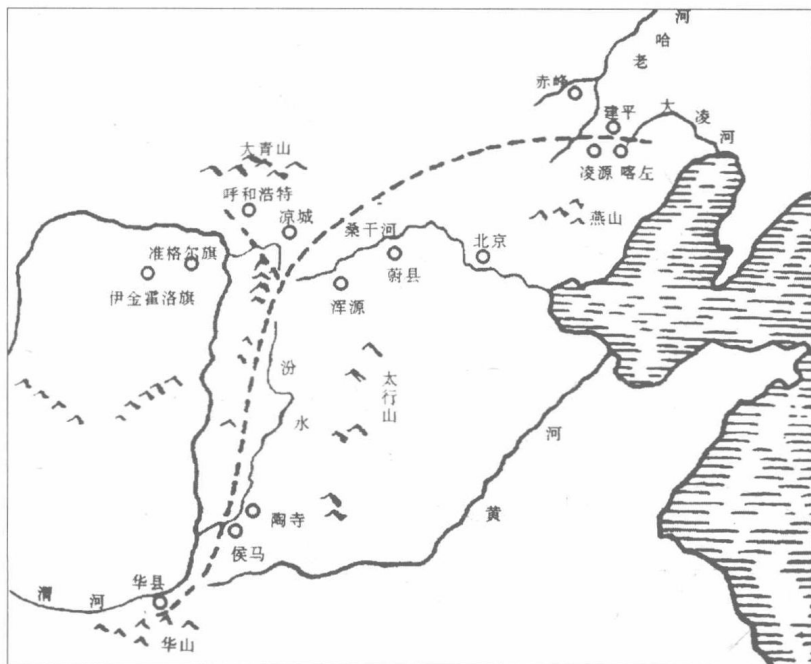


图 1：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同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并再向东北与辽西接，形成“Y”形文化带，华山脚下仰韶文化与燕山地带红山文化就是通过这条通道交流撞击的，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活跃的大熔炉，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

南结合。这很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禹舜，是洪水与治水。史书记载，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还只是承认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理想变为现实的是距今 2000 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中国’概念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这也是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夏商周三代以至更早就已出现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区看得最为明显。我们已经认识了前仰韶文化是一种组合，而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出现就是一种重组，其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

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在距今 5000 至 4000 年间的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中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

又如，张谷林先生在论述北京城中轴线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时，也是从几个具体的节点，即新的历史文化的建造开始的。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竖立和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位于北京城元明清中轴线南端延长线的“中国航天科学发源发祥地”的建造和位于北京城元明清中轴线中心点向北端延长线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的建造等，都是从微观的角度提出问题作为论说的基点或起点，经过一定的真实简要的过程叙述，使人们对变化的背景有了客观的感性认识，然后再进行宏观的综合论述，提出观点和见解。其所提出的看法，也是很有启迪性和参考性的。

譬如说：“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立即在曾是皇家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位置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有着扭转乾坤的历史性精神文化的里程碑意义。……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立于新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位置上，它还立于北京城市的传统中轴线上，与传统中轴线北端点元大都的堪舆中心点钟鼓楼和南端点的乾隆御制碑相对应；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永久的人民英雄丰碑，形成一座满载着新时代精神信仰和意识思维文化原理，让人崇敬怀念而又至高无上，追怀伟大复兴梦想的现代都市的中心地标。……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主导的天安门广场地标建筑环，以中轴线为开放的‘中’字立体画面建筑环形式，非同于封闭的明清皇家宫殿紫禁城建筑群。它摒弃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皇权至上专制文化，创新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生命的源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表达的是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意识。这是促进每一个人的魂魄意识的文化变革，从私家天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天下大同梦想。这一梦想，向世界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文化政治文明，而梦想即为目标！这一地标建筑环，从根本上传承改革创新了长城与传统中轴线的中华根文化，表现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人民性先进文化普遍原理，是中国人民奉献给现代、未来生存信念的中国梦想，已经成为典型的近现代创新型文化遗产。”（见本书第三卷第 161 ~ 163 页）

对南苑航天发源发祥地的建设，张先生的评论是：“新时代北京城建规划，明确延长的中轴线，真的使北京的古今中轴线，通过现代科学的发展通天了，与‘天’交了朋友。这片区域，将可考的中华古人类上万年的‘天’文化意识信仰思维梦想，衔接转变为现实科学天文化；将北京传统中轴线古老的中华魂、中华根文化，与近现代的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长城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国歌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等链接了起来，构筑成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文化意识信仰思维新高峰。因为，北京城建规划中延长的中轴线南端点，三营门与五环路之间，是中华民族航空事业100多年来的诞生发源地，也是中华民族航天科学事业60年来的发源发祥地。这里，拥有一位位亲身经历了近现代各个精神文化的形成过程而走过来的人，他们在这块区域内建设了现代中轴线，乃至全世界最显著的航空航天诞生、发源、发祥高科技地标建筑群。这一航空航天的摇篮圣地，所创造的光辉伟业，为北京世界城市的辉煌绚丽增光添彩。尽管这是一片很朴实无华的建筑群，是没有地标物的地标群，但是与古老传统的‘枕居庸’中轴线精神意识信仰思维牵头部分相映照，却是一片真实的中华民族现代科学‘天’文化高峰！反映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近现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引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最困难的时期，在中华崛起和改革开放豪迈奔腾的激荡中，抒发着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中国梦的不断追求，经过中国人民和一代代航天人无私奉献的辛勤创造，中国人飞上了天。中国航天发源发祥地所表现的‘天人合一’，充满了兴国与强国的科学国魂。”（见本书第三卷第222页）

对北京城中轴线北延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这一节点，张先生也有一段自己的评价和见解。但这种认识是在分析了一些人们对北京城中轴线的不同观点后升华出来的。他说：“这两位先生所提观点的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北京中轴线表现的是古代的皇家文化还是古今中华文化，北京中轴线是否足以体现新时代高端精神文化的争论？”“从侯仁之论述的700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三个里程碑得到很多启发。侯仁之试将明代及明以后建成紫禁城作为中轴线的第一个里程碑，看来主要是出于城市规划和建筑美学的基本考虑，没有更多地涉及中华文化大背景。事实上，如果研究者将元初少数民族统治者元大都定立堪輿中心点的文化信仰思维指导意识，纳入中轴线第一个里程碑的最初阶段，就会直接显示出中轴线的文化原理深意。中轴线第一个里程碑，是具有中华根文化和多民族融合深意的第一突出阶段，是一种可能使所有的汉族统治者都愕然的历史性表现。也就是说北京中轴线从规划建设的第一时间起，就存有中华根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精神文化原理基因，这个意义远大于紫禁城的建设。蒙古族统治者以此文化与物化的方式，‘自为’象征中华多民族大家庭，‘自为’尊崇中国多民族同一祖先，使几千年来所受到的民族排斥遗传在这一刻融合了。也正因为如此，作为第一个里程碑，元、明、清三代封建社会时期的不同民族统治者的中轴线，都是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从元大都的堪輿中心点位置钟鼓楼建筑群，先后向南走向丽正门和永定门，自觉严格遵守了元大都‘枕居庸’的中华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我们从传统中轴线实体，可以看出明代的中轴线是向南延长的。清朝的另一

代满族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再次以永定门燕墩御制碑碑文的方式，表达了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文化实质，还在碑文中以十组与长城有关的关键词汇，阐述了中轴线‘天文化’西北来向的明确观念。这样，北京传统中轴线的文化属性，就从低级的皇权文化跃升至中华大文化的高端意识‘根’文化，因而紫禁城皇家的‘天’是从‘枕居庸’的中华‘天’文化格局而来。”（见本书第三卷第300～305页）

（注②：指张文在释读“乾隆御制碑”文时提到的：“短短的20句诗中，乾隆用了两个‘带’字概念，一个‘居庸’，一个‘丕基式廓连两京’，一个‘开阳’，一个‘大纲’，一个‘天阊’，一个‘地灵’，一个‘天衢’，一个‘中央’，共十组具有文化地理意蕴的关键词。”）

“1959年，第二个里程碑的根本文化原理，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文化原理，是通过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文化前进积累的，明显通过物化的天安门广场外在扩建形式，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前面，笔者提到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由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环，从第二个里程碑规划建设指导的第一时间，即将传统中轴线的文化内质，彻底转换为‘为人民服务’的‘天人合一’精神文化，为传统的中轴线赋予了崭新的文化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或者一种文化定义的简单改变，而是一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落后文化的根本取代。从此，一个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最完整的文化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成为北京中轴线所表达的中华根文化的精髓。侯仁之认为的北京城市建设第三个里程碑，有一个我们完全了解的渐进过程……1990年，中国政府组织者曾在早期为北京亚运会选址时，无意中（注③）将中轴线向北延伸……中国赢得了2008年的奥运举办权……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北京市政府将中轴线北进专题，第一次正式纳入北京城市的建设规划。并在具体设计方案中，明确了北京现代中轴线向南向北各自迁移至南北五环线。……人们在欢庆中不能忽略一点，如何理解中轴线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正式北进，是正确分辨理解北京中轴线中华根文化极为重要的先进文化原理轴心。2008年延伸的北京城市中轴线，并没有坚持元、明、清三代皇朝的仅向南迁移的历史事实规矩，而是根据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前进道路的要求，继1959年第二个里程碑，经过第一次向北四环延长之后，又在北京城市的正式规划建设中，第一次明确地宣告向南北五环同时延伸，实际表现为又一次对中华历代中轴线文化意识信仰思维的重大突破。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以南延表达了对传统规矩的继承，以北进表达了



对传统意识的改革创新突破，以南北延伸共同表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走向世界，一路高歌。

（注③：“无意中”者，实际上是人们大脑中，关于城市建设中，中轴线观念的“潜意识”的反映。中国城建中自古以来形成了一种中轴线的观念，除了表现在“显意识”的大量事例外，同时也在“潜意识”留下了深刻的映像。所以，一提到城建，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向此靠近。所谓“无意识”即此之谓梦想也。）

“为什么笔者会这样判断？在中轴线这个问题上，如果仅仅表现为物化的建筑对称美，城市的建设布局需求，那就不会存在任何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的延伸问题。只有在表达时代性文化的本源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的象征性前提下，才会出现如何看待中轴线走向的问题。因为，在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带有明确象征性标志性质的中轴线文化建设，一直是中华民族坚持的本源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的外在物化表达，而北京的中轴线又是中华民族最本源核心的象征性精神文化梦想的文化原理的集中体现。自古以来，表现在文物物化形态上的发展，具体形制上存在的时代性变化，都会在一定程度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象征性美学理念。在这种理念的驱动下，人们会从自我根深蒂固的潜意识中，得到象征性美学所明显表达的文化意象，这些意象所表达的正是人们的阶段性文化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这些文化原理的进步性，正是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梦人民梦，指导着人们的道德操守和行为意念。北京中轴线在现代正式的城建规划中，向北的突破性延长，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和民众的文化意识信仰思维的突破。而且不仅是在中轴线向北的突破上，在鸟巢、水立方等中西结合的对称艺术建筑上，在标记着中华民族文明史与自然环境艺术成就上，在科学理想的生态园林环境特征上，其最值得称赞的伟大之处：正是以中华民族最传统的轴线物化特型，标志着整个中国都在向一个世界梦怀方向前进。把自然山水通过艺术的哲学的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深层提炼，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对大自然的尊重，表达了中国人民最新最自然的‘天人合一’文化意识信仰思维的清静生态环境解意。以国家都市中轴线的外在象征性形式，宣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在向着世界的和平、低碳的生态环境融汇竞跑。……北京中轴线的北进，代表了中华魂与根文化原理的再次世界性包容和飞跃。北京现代中轴线北端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及中心区的建设，完整形成历史传统、现代发展和未来展望的北京中轴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前进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大自然与人类全面融合的生态环境基础上，践行奥林匹克‘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的人类精神，更快、更高、更强地走向

世界，与世界融合发展，建设世界城市。这就是热爱祖国的‘天人合一’具体形象化创新体现，也是具有大爱厚德‘为人民服务’的宏伟体现。这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与综合实力的历史性飞跃，反映了中国人民已经将人民的幸福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中国人民已经具备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一体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梦、世界梦意识信仰思维文化原理体系和综合国力。”（见本书第三卷第306～310页）

再如，对北京三堡村石像群的研究，也是从1986年在北京延庆县八达岭镇关沟要道中部出土的十五尊古代石质人物造像这个微观的石质文物开始的。

通过宏观的分析探索，张先生认为：“十五尊石像最大的可能性，至少为四个不同年代制作。其中，三尊主石像中最大的一尊头脸部，为史前较早时期制作，年代下限约为4000年至5000年间；另两尊主石像头脸部，制作年代较第一尊晚，同为史前时期。笔者赞同其他学者的一种看法，三尊主石像的脸部原始纹样，有可能原是分别刻画在三座巨石之上的古岩画。三尊主石像的身体部分，最初应为未雕制的整体巨石，后改凿为石柱。再后改制为半圆雕作品。第四尊为辽元过渡时期制品，其余十一尊为元代制品。三尊主石像的身体形制，先后出现明显的三次凿磨、雕刻形制和痕迹，雕刻形制为后世修改增刻，还需要继续研究分析。这样的年代划定，是可以解释清楚的”。“由于十五尊石像生产制作时代的不同，形成六种不同的形制风格特点。三尊主石像头部占有两种不同的形制风格。三尊主石像身体服饰形制为第三种。辽元过渡时期石像为第四种。五尊石像中的元代制品为第五种，十尊从祀石像总体为第六种。这种情况发生在延庆地区并不奇怪。据专家介绍，延庆地区的石刻制品，有不同朝代雕刻风格和形制等反复制作的传统混杂情况”。

“三堡村十五尊石像的研究，以史前祭祀祖先的石刻实物和元代国家‘通祀三皇’大典礼仪，经过数千年两阶段的传承延续性，突出了中华多民族认同全民族同一祖先的本源文化核心。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从保护文物出发，多视角深层次的研究、托出了长城峰岭文化现象学术观点。从而丰富了文化长城的内涵，昭示了长城峰岭文化地域对中华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贡献，展现了中国长城‘天人合一’天文化原理之魂；认为长城峰岭文化现象是中华早期文明的标志性文化现象。长城文化的核心是长城精神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凝聚爱国精神始终不变的生存意识本源文化；八达岭长城峰岭地域是中华民族的‘根’地域，也是呈现中华根文化的代表地之一。”（见本书第二卷第92～93页）

第二，文中通篇体现了“发展观”的思维方法。

“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之一，用“发展观”分析认识事物的问题，正是当今学者治学中应坚持的基本方法。张先生在行文中用此方法分析所探讨的对象时，不仅表现在长城峰岭文化的研究中，尤其表现在北京中轴线的讨论中。